

在国外的日子里，

陈家琪著

有所思





在国外的日子里,有所思

● 陈家琪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在国外的日子里,有所思

陈家琪 著

责任编辑:萧 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湘潭县印刷厂印刷

*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25

字数:155,000 印数:1—4,500

简易精装: ISBN7-5404-1977-6
I·1564 定价:10.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上 篇

巴黎，并不陌生的地方	1
Metro	6
夏洛特·科黛	9
性善与性恶	12
超市购物	16
塞纳河之夜(上)	18
塞纳河之夜(下)	22
大国风范	26
埃菲尔铁塔	30
蓬皮杜艺术中心	33

卢森堡公园	37
“一本表现精神在恶中骚动的书”	42
印象中的偏见	47
得天独厚	52
巴比松	57
七月十四日(上)	60
七月十四日(下)	64
一个法国女人	70
长胡须的蒙娜丽莎	75
在墓地	79
马克思故居	84
科隆大教堂	89
走马荷兰	93
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	98
心想事成	102
命运	107
不骑马的卢梭	112
勃朗峰	116
圣米歇尔修道院	119
走向深渊	123

下 篇

犯罪感的消失	129
责任在谁	133
“抽象的平等”与“事实的不平等”	137
精神贵族	141
语言是存在的家	145
荒谬	149

富裕	152
生活是个剥不完的洋葱	156
自信	162
野趣	166
竞争	168
知识分子	171
直觉	176
感觉	180
意志	184
附 录 关于《旅法笔记》的一封信	188
后 记	194

上 篇

巴黎，并不陌生的地方

奇怪的是，第一次到巴黎，并无陌生的感觉。

从拿到护照、办完签证，一直到从香港飞到曼谷，再从曼谷转乘前往巴黎的泰航班机，我都一直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飞往巴黎，怀疑这飞机是否真能降落在戴高乐机场，那里是否真的有人在等着接我们。

想到有人在机场等着接我们，心中涌起一丝暖意，对那个陌生的地方也渐渐萌生出“家”的感觉。

去巴黎有“回家”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有些奇怪。

也许，这和对巴黎的名胜建筑、博物馆、公园、图书馆太熟悉了

有关,还有就是那么多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提起来简直如数家珍,像圣女贞德、拿破仑称帝、诺曼底登陆、六八年的五月学潮,更成为大家随口就能发表一通见解的日常话题。记得很早开始读希腊神话,特别是特洛伊传奇时,就知道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Priam)与王后赫卡柏(Hecuba)生的第二个儿子就叫帕里斯(Paris),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巴黎这两个字。赫卡柏王后在生帕里斯时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见这个儿子是一个生有一百只手而且每只手里都拿着点燃了火炬的复仇女神。出于害怕,就叫人把帕里斯抱到野外,希望有野兽能吃掉他,谁知帕里斯竟能与熊很好地生活在一起,并日渐成为一个健壮、勇敢、漂亮的小伙子。于是有一天宙斯就让帕里斯来裁决赫拉(Hera,象征着力量与权势之美)、雅典娜(Athena,象征着知识与技巧之美)与阿佛洛狄特(Aphrodite,象征着绝色与温柔之美)这三个女神中谁最有权获得那个招惹来人世间一切纠纷的金苹果。帕里斯把金苹果给了阿佛洛狄特,因为只有她的芳香与艳美才可称为真正的美,而且她答应以后一定要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绝代佳人海伦(Helen)那里去,让海伦成为他的妻子。由此而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围攻特洛伊之战,而著名的“特洛伊木马”(The Wooden Horse)更为国人所熟知。

特洛伊是小亚细亚西北部的一座古城,帕里斯是特洛伊城的王子,他掠走海伦,引发特洛伊之战,最后又怎么以他的名字为巴黎命名,这恐怕需要专门的学问。但帕里斯这个名字就是今天的巴黎,而且总让人想起赫拉、雅典娜与阿佛洛狄特这三位女神之争则是无疑的。去巴黎前,我又专门细细读了一遍希腊神话,因为我知道在卢浮宫、凡尔赛、枫丹白露一定有许多与希腊神话有关的雕塑;而且“卢浮”(Louver)这两个字的由来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有人说它意味着“环城”,有人说它与“麻疯病院”、“猎狼的巢穴”、“灯塔的眺望台”有关,总之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我想,巴黎之

所以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恐怕主要就在于它的神秘性。越神秘就越吸引人，时间久了，就对神秘也产生了一种亲近感。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法国在传统上是个多移民的国家，在给“法国人”下定义时，历来就有两种定义的办法，一种是把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因素和血统的人们称作法国人，另一种就是把法国大革命以来凡认同“自由、平等、博爱”这一人类理想的人都称作法国人。这后一个定义使得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最为淡薄，而且使得法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标志着人类理想和共同价值的象征。我们到法国去，无疑也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普遍价值的吸引，正如在前几十年的革命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前苏联、中国的共产主义理想曾对世界各国的革命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一样。

但现在又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一方面，越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各个民族的文化差异性也就越得到肯定，比如拿破仑出生的科西嘉岛尽管仍讲法语，但部分公立学校已开始用科西嘉语授课；另一方面，文化多元主义中的多元与差异可以扩展到何种地步，它与“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理想和主权统一如何协调毕竟又是个现实问题。谈到种族歧视和移民政策，无论是向主要民族、基本文化靠拢，结果就是被其同化；还是采取隔离政策，尽量保持各自的多元与差异，让他们少有接触，其实都有种族歧视和排外之嫌。现在，当我们飞向巴黎时，巴黎到底是以怎样的姿态面对外来者的呢？我之所以并不感到陌生，就是因为心灵深处还依旧保留着“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念，并认为这信念使我与法国有了某种历史的认同感，尽管在哲学上我已有了更多的反省与自嘲。

飞机降落在戴高乐国际机场时，是1996年6月28日巴黎时间早上7点整。我们的飞机是在北京时间28日凌晨1点从曼谷起飞的。这真是一种极奇异的感觉。由于飞机一直向西飞，大约和日出同步的缘故吧，反正我们总处在晨光熹微之中。这种感觉从北京

时间凌晨4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将近2点时飞机降落，而此时的巴黎也才刚刚苏醒过来。

在泰航班机上服务的先生、小姐可真叫笑容可掬，同时又是那么的亲切、自然。从半夜1点飞机起飞到早上7点(实际是下午1点多)飞机降落，送了三次正餐，还不停地送各种饮料，虽说按钟点已到了吃饭时间，但由于半夜起飞，又未睡觉，而且天色总在似明未明之间，所以也就提不起食欲。可见人对时间的知觉更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不是手表上的刻度。

飞机降落时，看到机场的草坪上有那么多兔子跑来跑去，真使人感到惊喜。城市越大，现代化程度越高，人就越想在城市里看到绿色，看到森林、湖泊，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哪怕是家养的，只要自由自在就行。巴黎就是一个这样的城市，听说那里至少养着3000万只以上的狗，而且许多家庭在计算家庭人口时往往把狗也计算在内，一只狗的花费和人也差不了多少。狗与住房、汽车、衣着、珠宝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从主人与狗的关系中还折射出人的教养、风度、爱心。有人称巴黎为“狗市”或“世界上狗屎最多的地方”，这也许是事实。但对狗屎的清扫和管理及人们对此问题的宽容与理解，又同时反映着一个城市人们普遍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狗或猫绝对是一种能体会或能满足人的感情需要的动物。当我们看到机场上跑动着那么多兔子，想到这里的几千万只狗与猫时，陌生感就会慢慢消失。

原先以为出海关是件很麻烦的事，因为受朋友之托，带了两瓶北京王致和的臭豆腐，总怕海关的检查人员因为搞不清这是什么东西而不让带入法国，为此把有关臭豆腐的几个英语单词记得烂熟，比如“strong-smelling preserved bean curd”(有强烈味道的豆腐)，“Chinese pickles”(中国腌制品)等等。谁知人家连问都没问就放我们过去了。后来听法国的朋友说，就臭而论，法国的奶酪其实并不亚于臭豆腐，可见凡在吃上有些专门讲究的民族，也就一

定会在“臭”上作些文章。早知如此，当初应该多带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去。顺便说一下，入关时没有检查，出境时也未查看我们的行李，只把护照扫一眼就放行，甚至连章子也不盖。也许在西方世界容易搞恐怖活动就与他们的松懈有关；但这种松懈同时给了人很大方便，使人不会因步入一个新的国度而惴惴不安——其实要找麻烦总是很容易的。

从机场到住所，等于在巴黎的边上绕了半个圈。从窗口往外望去，仿佛这些存在了几百年的街景也在我脑海中存在了几十年一样熟悉。就是远远看见埃菲尔铁塔，没有任何新奇的兴奋，因为在电视和电影上毕竟看到的次数太多了。到了住所，就更有“到家”的感觉，甚至连气味都是极熟悉的。28号之长差不多相当于过了两天。当我们晚上12点上床睡觉时，妻说，现在该是北京时间的29号的清晨了。

那天晚上，另一家朋友（北大西语系毕业，已在法获得博士学位）因钥匙忘到了家里也带着两个孩子与我们住在一起，挤是有点挤，但又让我们回忆起“文革”和当知青时大家一个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时的亲密无间。也许这真是中国人——至少是我们这代人身上所残留的最后的美德了。

四周是这样的静，除了比西安、武汉、海口（这是我住过的三个城市）的六月底要凉许多、需要盖棉被入睡外，用什么能证明我此刻正躺在巴黎的市中心呢？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纠缠着我，直到回到中国，仍想不出能最终证明的方式。

也许，如下的《旅法笔记》不过是眼下所能想出但又显然归于徒劳的另一努力罢了。

Metro

有朋友对我说,在巴黎游逛时,要注意两个大写的而且标志十分显著的“M”,一个是“麦当劳”(Mac Donald)的“M”,另一个就是地铁(Metro)的“M”。注意“麦当劳”,倒不是为了找吃饭的地方,而是为了上卫生间。“麦当劳”里的卫生间之干净卫生自不待说了(其实任何一个地方的厕所恰恰是最要讲究的地方),主要是方便、显著;那怕是明知你只是要用一下卫生间,服务人员也个个面带欢迎的神色。所以“麦当劳”里的卫生间往往需要排队。女卫生间的队较长,有时服务人员就让她们到男卫生间去方便,自己则垂手肃立在门口表示谦意。不仅在法国,就是到欧洲其它国家,只要见到

了“麦当劳”那巨大的“M”，我们总会发出会意的一笑。在任何大城市，入厕总是一个不得不让人紧张的大问题。

至于地铁，更是巴黎的主要交通工具。在巴黎市中心，只要迷了路，随便往任何一个方向走不多远，总会看见一个红色的“M”，那就是地铁。一下地铁，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可以坐几路车，中途在哪里转车便一目了然。巴黎地铁，据说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不算通往郊外的快线慢线，仅市内就有十三条线路，可以把你送到巴黎的任何一个角落。一些中心站如 chatelet 简直如地下迷宫一样复杂，上上下下也不知有多少层，但路标却很清晰，只要你记住你要去的方向的终点站，总会七上八下地走到站台上。地铁站里有商场、书摊、咖啡馆，更有艺人即兴演出，也许与在地下有关，总之音响效果很好。许多人都会在疾行中驻足观望或聆听，有些人会放些钱进去，但不见他们自动上来讨钱。

巴黎市区内几乎见不着立交桥和人行天桥，一则靠的是良好的交通秩序，但主要的，恐怕就是归功于地铁了。

巴黎的地铁票与公共汽车票通用，只要不出站，一张票任你转多少次车都可以。总有人在混票。我身后就曾有过人趁我把票插入检票机通过自动开关的通道时紧贴着我混过去，过去后再向我挥挥手表示谢意，我也只好一笑了之。在地铁的列车上也偶有查票的，未买票的自然要罚款且数额达十数倍以上，但双方都很坦然，仅只是例行公事而已。查票员很客气，接过钱时总免不了说声“谢谢”，而被罚款的人在接过收据时也以“谢谢”回敬。周围的人根本不看他们，仿佛什么事都未发生一样。也许这和他们相信“性恶说”有关，觉得只要有可能，其实人都会做坏事。解决的办法不是思想教育，而是社会总会找到办法使做坏事的“失”大于“得”。最主要的当然是舆论公开，公开的结果自然刺激着传播媒介专找那些“坏人坏事”的“阴暗面”来报道，因为只有这些事才有吸引力。所以打开电视、报纸，看到的新闻大都是些“人咬狗”的荒唐事，而且眼光

盯住的也主要是那些有权有势可以有办法逃避舆论监督或把“人咬狗”说得头头是道的人和事。多宣传好人好事，可能会使一些本属正常、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的人和事（如某官员不受贿、某服务员态度好等等）变得越来越稀罕，而坏人坏事说多了，又可能使一些人想着办法出奇制胜，成为新闻人物。但不管怎么说，通过舆论的曝光和争论，社会是总有办法在全民参与中想出一些办法（如法律、制度、措施的完善）以防止做坏事的人“得”大于“失”的，久而久之，“得”“失”之间的权衡也就作为一种人们对于理性的“共识”制约着人们的社会心理并渐渐形成某种强制性的文明机制。

巴黎地铁就是展示巴黎社会风气及其文明机制的窗口。恐怖活动丢炸弹在地铁里，驱逐非法移民了，在地铁里可见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要封锁什么地方了，要闹罢工了，最敏感的部位也是地铁。去法国前，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部法国电影的名字就叫《巴黎最后一班地铁》，而我们也有意无意地在凌晨一点前后坐过两三次巴黎最后一班地铁。最匆忙和最闲散的人都在地铁里，那可真是一个五花八门的社会万花筒。每天从早到晚，人潮在里面流动着，大家的方向都不同，但又总免不了受着“出口”、“进口”这两字指引，就如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人生大舞台一样，谁都这样来去匆匆的奔忙着……

夏洛特·科黛

在中国,知道夏洛特·科黛的人不会太多,知道马拉的人要稍多一些,知道一个女人(也就是夏洛特·科黛)在浴缸里杀死了法国大革命时的一位风云人物(也就是马拉)的人更多一些,而知道法国大革命这回事的人当然最多了,列宁曾说,“以至整个 19 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那是一家名叫 Le procope 的咖啡馆,门前的招牌上印有这么一行金字:始建于 1686 年。整部法国近代史几乎就浓缩在这家咖啡馆里。在二楼的餐厅,堂而皇之地摆放着伏尔泰的写字台,上面

还有一支古老的蜡烛台，后面的书架里放着伏尔泰常看的一些书。莫里哀、卢梭、富兰克林、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等等风云人物都常光顾这里，顶楼的一间小屋就是当年山岳党人密谋推翻帝制的地方。更有价值的是这家咖啡馆保存着拿破仑签名的手迹，一份是成名前的，一份是奥斯特里兹战役后的；还有一份沾满血迹的手迹，这是罗伯斯庇尔在被子弹打穿脖骨后签发的最后一份命令。

那天由于是午后，咖啡馆里的人并不多。我们几个人随意在里面走动，从大厅一直看到顶楼。墙壁上全是文物，有各种各样的图表、画像、手迹、遗物、签名，而且大多是用法国大革命年代的报纸裱糊起来的，每一层楼最显著的地方，多印的是卢梭或伏尔泰的名言，这两个人虽说活着时不共戴天，死后却受到同等的尊敬，在先贤祠的墓穴里，一边是高昂着头的伏尔泰，他对面就是只能伸出一只手大声呐喊着的卢梭。咖啡馆的木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但仍给人摇摇欲坠的感觉。越有这种感觉，人也就越小心、越珍视周围的一切。每个人都屏气息声，尽量使自己不发出声音。

最使我惊讶不已的，就是在山岳党人密谋的小房间里，赫然悬挂着一幅夏洛特·科黛的画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画像，我相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能见到她的画像的地方也不会有几处了。据说巴黎蜡像馆里有马拉被暗杀的场面，但不知是如何表现科黛的。马迪厄和米涅是在研究法国大革命上观点全然对立的两位历史学家。马迪厄坚定站在山岳党人一边，认为夏洛特·科黛这位“伟大的科内伊的后人是个彻头彻尾的王党”；米涅则更倾向于吉伦特党，称夏洛特·科黛是“勇敢美丽的少女”，说她在“实行了她的壮怀激烈而于事无补的计划之后，就带着纯朴的英勇气概和舍生取义的精神泰然死去”。夏洛特·科黛受刑时年仅25岁，死前拒绝牧师为她忏悔，还对主审官说：“我杀了一个人，为的是拯救十万人。”但她一个人也未拯救得了，反而使更多的人走上了断头台。米涅说，暴政从来就不系于一人，而是系于某种暴乱的形式和血腥的

权力。

面对夏洛特·科黛的画像，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血腥的年代，今天的协和广场也仿佛又恢复了它的原名——革命广场，于是就能听到一辆又一辆的刑车从丹普尔堡、从位于希堤岛上的囚室（我在那里曾看到过一份关押在这里的 2780 人的名单）里拉着一车又一车的人到这里受刑。随着断头机的起落，一颗又一颗的人头滚落到了地上。

夏洛特·科黛想用暴力制止暴力，结果却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暴力，她带着纯朴的英勇气概和舍生取义的精神死去，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哪一个又不是怀揣着这样的气概和精神死去？

在革命年代，人是极容易出名但又极容易被人们忘记的，因为人们看到的人太多，日子也过的太快。屠杀几乎使每个人都同时获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什么才是他们所想享有的后世的尊崇和荣誉？马拉被刺死后葬入先贤祠，他的心悬挂在哥德利境俱乐部里供人瞻仰，到处都可见到他的半身塑像。但两百年后的今天，我在先贤祠里并未见到谁在寻找马拉的陵墓，我也不知道他是否还葬在这里。倒是在希堤岛上的囚室里，一批又一批的人站在玛丽王后和罗兰夫人的蜡像前肃穆沉思。

只有大卫的那幅著名的《马拉之死》的油画还依旧向人们讲述着这件事以及这件事的制造者——“勇敢美丽的少女”夏洛特·科黛。